

新疆考古资料

内部参攷
注意保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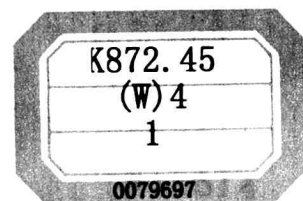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集

译文集

新疆探索史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物馆

1976年6月



《 新 疆 探 察 史 》

本书原名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
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, 作者 Jack
A Dabbs, .1963年 海牙出版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-0079697



343407

新疆探索史

第一章 从古代到1800年在新疆的旅行

第二章 探险时期：从1800年到北京条约

第三章 探险时期：从1860年到利瓦几亚条约

第四章 探险时期：从1878年到普尔热瓦尔斯基之死

第五章 考古时期：从1888年到斯坦因第一次探索

第六章 考古时期：从1901年到1914年

第七章 政治时期：从1911年到现在

附 注

参考书目

附 图

第一章 从古代到1800年在新疆的旅行

在纪元以前，欧洲人对于这一地区所知甚少，尽管也有一些证据表明，有人曾经到此旅游。中国人对于这里，也不太熟悉。就在纪元开始之前，中华帝国才对现今甘肃以西的地区，建立了时断时续的控制。中国最关心的是，把西方部族阻挡在长城之外。新疆地区曾有几个独立的部族王国，以喀什噶尔、^叶尔羌、和阗和塔克拉玛干以北其它几个主要城市为中心。亚历山大大帝实际上到过喀什噶尔地区，并且有个短暂时期，曾经控制这块地区。后来，他的军队沿着一条今天看来骡马都难通过的道路，还向中国挺进⁽¹⁾，在塞流古王朝时期，希腊人对这一地区的所知，似乎还在继续留传，因为斯特拉波对此还有所知，而且托勒密的地理书，也有一些相当准确的报导。⁽²⁾

我们所知第一个曾经到过这块地区的，是中国皇帝周穆王。他作为一个旅行家，喜欢远出游历，约在公元前985—980年之间，就曾涉足新疆东部边缘的青海。⁽³⁾

中国与欧洲或利凡特（Levant）之间，大概从来未曾完全中断过接触，其陆上通路几乎不可避免要经过新疆。尤其出名的是历史上三条通道：一条是“丝绸之路”，经由车尔城（且末）、和阗、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西行；一条是天山南路，沿着塔克拉玛干北翼而

行；还有一条是天山北路，从哈密经由喀喇库尔（Karakol）、乌鲁木齐、玛纳斯、楚库察克（Chuguchak）到俄国边境。另一条一般可行的通道是海道。⁽⁴⁾ 自北而南的通路虽可从现在的斜米巴拉丁斯克经由伊犁、穆札尔特（Muzart）、阿克苏、和阗、列城进入印度，但是同东西向的通路相比，这条道路似乎不大重要。⁽⁵⁾ 在公元前138—126年之间，第一位中国使臣张骞前往西域打通商务关系，带回了有关中亚的第一批新闻和地理知识，他便是经由东西向通路往返的。⁽⁶⁾

在公元第一世纪，班超远征西域，经由喀什噶尔出至里海附近⁽⁷⁾，中华帝国的控制由是扩及新疆，保障了商路的安全。班超甚至还想与罗马人沟通（那时罗马人已经成了中国的邻居）。在公元97年，这位中国使臣取道“丝绸之路”，最低限度到过安谷（Antioch）⁽⁸⁾

罗马帝国的资料表明，在公元前几世纪，曾有中国货物运抵意大利⁽⁹⁾。但是因为这两个帝国之间隔着一个安息，直接接触还相当稀少⁽¹⁰⁾。访问印度佛教圣地的香客，往往走“丝绸之路”到现在的叶尔羌附近，然后南行经由西藏进入印度北部。第一个这样的香客就是释道安，他曾在公元316年旅游印度，写过一部游记

《西域记》，记述西域诸国，並附有地图，但是今已散失⁽¹¹⁾。

他返回报命之后，425年便有迦毗罗（Kapila）王遣使前来通好，这也显然是取道新疆。前往印度朝拜的僧侣还有：惠生（6世纪）、宋云（518年）、玄奘（629—645年）、法勇

(420年)、〔12〕昙无讖(453年)、义净(671—695年)、悟空(751—754)等。义净是经由海路而行，兹此不赘。后来西往求法的僧侣，大都取道新疆，成为印度佛寺的常客。

玄奘写了一部详尽的游记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原来玄奘学佛数年，发愿前往佛国朝拜，然而当时皇帝有旨、禁止跨越国境。但是他终于起程越过戈壁到哈密，由此历尽艰难经由天山南麓而西出新疆。他走过恒罗斯河谷、塔什干、萨马尔干和乌浒河上游，在这里见到白匈奴(伊兰族)，然后南下进入印度。他在印度游学数年，归时取道帕米尔、喀什噶尔、和阗、罗布泊而渡沙漠返回，带来佛经657部、圣物150种。玄奘归来受到欢迎，並受命撰写行记，述其所经见，这便是所谓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〔13〕

就在这些年代，景教教士前来中亚传教；甚至在638年，中国也接受了景教〔14〕。到14世纪，景教在亚洲便有25个大主教管区，其中之一就是土耳其斯坦〔15〕。他们来此传教，至少有一部分走的是“丝绸之路”。传教事务得以保持，表明有着持续不断的接触。摩尼教行于蒙古和土耳其斯坦，也证明这里与中东有着连续接触。摩尼教的兴起晚于景教，也许是在9世纪，或者是在穆斯林的统治建立以后。

波斯有人前来旅游，这是大家所熟知的，尽管其名不传于世。摩尼教传到中国，是在558年的时候，到621年就在长安建立了寺院，当时还有政府官员受命管理景教事务。信奉佛教的印度和

暹罗，对于景教是排斥的，景教教士前来传教，显然大都取道“丝绸之路”。631年波斯僧侣何禄到中国，不详其所宗，大概他是一位祇教徒。694年又有另一位波斯僧侣到中国。719年到中国的则是一位摩尼天文人。波斯的摩尼教徒来此以后，至少在763年左右就曾劝使一部份回鹘部落信奉摩尼教，并且带来了叙利亚文字。在768年，回鹘人允许摩尼建寺于鄂尔浑，在771年，还准备建立一些摩尼寺院。840年回鹘被赶出蒙古，被迫进入新疆和甘肃地区，在那里也建造了一些摩尼寺院。三年以后，中国禁绝摩尼教，焚烧他们的寺院和经籍，有70位教士被处死。这个时期的入教者，大概多是当地人士，到波斯旅游则是绝无仅有的。〔16〕

在747年的时候，西藏人对新疆诸城发动了一系列的入侵，甚至占领了几个重要地方。西藏人如果继续向西进军，就可能联合伊朗的穆斯林结成同盟。出了这种担心，（中国）便以高丽人高仙芝为将，率领大军前去阻击西藏军队。高仙芝经由天山北路行抵喀什噶尔，在今塔什库尔干附近和帕米尔以南，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。另一支军队还远入印度吉尔吉特〔17〕。

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（yazdigird）三世，当年面临穆斯林入侵威胁时，曾向唐高宗求助，唐高宗拒不出援，但是在伊嗣俟死后，他接受伊嗣俟之子卑路斯（Firuz）前来避难，甚至承认他是波斯王。卑路斯来到中国是走哪条道路，我们还不清楚，但是显然经过新疆地区。唐高宗未能援助伊嗣俟，这便使中国西境

任由穆斯林侵入。早在655年，穆斯林的使臣就曾走同一条路线前来中华帝国〔18〕。

751年穆斯林取得了胜利，遂使土耳其斯坦脱离中国的控制，中国对这一地区情况的了解亦告枯竭。虽然中东与中国之间还有人来往，但是没有留下记录，或者仅在阿剌伯编年史中有所记载而流传不广。海上往来当然也还在继续，不过已经转入穆斯林之手〔19〕。

在845年之际，（阿拉伯）的哈里发瓦西克（Wathik-Billah）因梦见和听说gog和Magog，以及土耳其斯坦与西方之间有长城阻隔，便派遣萨拉姆（Sallam）为使前来调查长城报命。萨拉姆一行五十人，带着5000第纳尔（薪水在外）首途。他们显然经过萨马尔干，沿着天山南路取道阿克苏，库车和哈密。受到很好的接待以后，他们又差不多顺着原路返回，前后历时约两年又半〔20〕。

表明来往未曾中断的另一个证据，就是依宾·霍尔达德·伯伊（Ibn Khordad Bey）那份宝贵的地理报告。此人是一位官吏，记述了880年穆斯林征伐各地的情况。这份报告大都是列举一些名字和传说。〔21〕

约在966年的时候，喀什噶尔地区的沙吐克·库克拉汗（Satook Kookra Khen）接受了穆斯林教。他的回纥族臣民跟着仿效。突厥语部族改宗穆斯林，对于西部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。到1757年之际，从西藏到塔尔巴哈台，甚至东至

云南四川，许多居民都已变成了穆斯林。〔22〕

在1081年，有一位西方使臣到过中国首都，但是不详其路线。这位使臣很可能是由海路而来。那时通路被穆斯林控制，这表明他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突厥人的首都。〔23〕

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中亚，就把整个中亚置于一个政权之下，尽管他们的行动暴戾，但是对于宗教、民族感和社会习惯等，倒还采取放任态度，这便使旅游来往再度成为可能。〔24〕因此在13世纪，又有中国的旅行家前往西方。有名有姓的是，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，1219年就曾跟随他的主子通过土耳其斯坦到西部。〔25〕

在1220年，统治中国北部的（大金）皇帝，曾遣使经由土耳其斯坦到波斯和兴都库什，往见成吉思汗。〔26〕

在1221年，有一位道教真人邱长春曾由中国本部到过乌里耶苏台、阿尔泰、别失八里、乌鲁木齐和天山南路、伊犁、怛罗斯、兴都库什，他的旅游结束于1224年。〔27〕

在1259年，有一位信使名叫常德，曾奉派前往报达（巴格达）附近旭烈兀驻地，他似乎走的是1221年长春真人所走的道路。〔28〕

这些旅游者大都留下了自己的行记，他们的记述对于所经地区的历史和地理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许多行记都已经发表，尤其是收录在布润珠的《中世史研究》一书中。

在蒙古统治时期，还有许多俄罗斯王公前往和林朝参大汗以求封诰。我们知道，雅罗斯拉夫和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就曾为此到过塔尔巴哈台地区。雅罗斯拉夫还是1246年于归途中死在蒙古的。显然这些人大都是走北道，虽然我们不知其详，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。〔29〕

蒙古侵入东欧和中欧以后，大量欧洲犯人曾被带往蒙古诸首都（主要是和林）为奴，他们在这里的遭遇不一。有手艺的工匠所得的对待比较宽容。卢布鲁克就曾会见过这类工匠，例如一位罗塞尼亚（Ruthenia）的工匠帕克特（Paquette）、一位英国人的儿子巴兹尔（Basil）和一位法国人布歇（G. Boucher）。〔30〕这些欧洲俘虏来到和林走的大概是北路，没有经过新疆，但是因为当时来往频繁，至少会有一些是取道新疆而来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很难有机会留下叙述自身经历的记录。

在1246年，圣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代表，曾取道斋桑湖经由塔尔巴哈台到过蒙古首都和林，〔31〕波兰的本纳迪克特（Benedict of Poland）随行，但是后者所写的行记，远不如柏朗嘉宾的行记有价值。

教皇英诺森四世不满意于柏朗嘉宾出使的结果，又在1253年派遣另一位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前来调查，以证实拔都之子撒里答是否为基督教徒。〔32〕卢布鲁克先到君士坦丁堡，鲍德温国王（King Baldwin）在这里也给他写了一封介绍函件。后来

卢布鲁克发现，所传撒里答为基督教徒一事纯属虚构；为促进传教工作，他还必须继续前往和林。随行的有巴尔托洛·毛斯（Bartolo Maus）、哥塞尔（Gossel）、尼古拉（Nicolas）和一名译员阿布杜拉（Abdullah）。卢布鲁克在和林逗留了六个月，取道北路访问了蒙哥汗的营帐。他的报告甚有价值，因为他证明了古时托勒密所说的赛里斯（Seres）就是中国；证明了里海是一个内海而不是海湾；他还记述了这里景教徒的生活〔33〕。此外，他还推翻了所谓中亚有一位约翰长老执掌政权的传说〔34〕。

在1254年，还有亚美尼亚王海屯（Haylon Haïton 或 Haïthon）取道天山前往汗庭表示归服〔35〕。他在蒙古宫廷耽了几年，后来才经由准噶尔、但罗斯、奥特拉尔（Otrar）、萨马尔干和布哈拉返国。他这次前来归附，拯救了他的国家免遭入侵。

在1260年，（意大利）波罗兄弟乘蒙古人商禁较为松弛的机会，曾由布哈拉前往中国，他们显然是走“丝绸之路”到汗八里。三年以后，忽必烈皇帝遣之西归聘请西方教士，他们便循原路而返。约在1271年之际，他们准备停当，带着两名教士和17岁的男孩马可波罗再度东来。这一次他们走的是南路，先经巴里黑（Balkh）和帕米尔，再走“丝绸之路”到中国，路上走了三年。1291年波罗一家返国，受命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前往波斯蒙古王廷以践婚约。这一次他们走的是海路，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。幸亏马可波罗学会了所在国家的语言和文字，相当熟悉那里的文化，为我们留下

了一部很有价值的行记，在提供有关中亚和中国的地理知识方面，超过了所有他的同时代人〔36〕。

在马可波罗以后，许多资料都说明通路仍旧开放。1340年有一位伯爵洛梯（F. B. Pogolotti）写了一部商业指南，其中就有两章是为旅游中国的商人而写的。尽管他提到的地名只有塘那（Tana）即亚速海（Azov）、萨拉伊（Sarai）、伏尔加（Volga）、阿斯特拉罕、乌尔干吉（Organj）和康州（Koncheu）及以东诸地，尽管他没有提到土耳其斯坦的城市，但是他所推荐的路线，显然是在这块地区〔37〕。

商人们很少留下自己的行记，虽然他们可能是来往频繁的。就笔录而言，两个最好的来源是教士和政治使节，他们都有文化，都负有写书面报告和记事的使命。不过马可波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要是商人都写经历，写出的故事也会同外交使臣和教士那样写得丰富多采。有资料证明许多旅游家到过土耳其斯坦地区，他们留下的记录有些是有助于增进对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的了解的。

在1288年，又有一位圣方济各会教士蒙特科维诺约翰（John of Montecorvion）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的函件来见（忽必烈）大汗。那时蒙特科维诺约翰年方35岁。他曾到达第比利斯（Tabriz），逗留甚久，1289年返回罗马。不久他又启程东行，还写了一封信，报告他在忽必烈汗的首都居住的情况，对于这封信件的日期，人们颇有争论。他显然是经由海路取道印度而

来。同他一道前来的是科龙 (Colonge) 的圣方济各会教士阿尔诺德 (Arnold) 和洛卡龙哥 (Localongo) 的彼得 (Peter), 还有一位是龙巴第 (Lombardi) 的外科医生, 据考证此人就是维托多兰的约翰 (Johannes Vitodoranus 或 Johannes von Winterthur)。

这位外科医生约翰从中国写来几封信, 但是写信的日期颇有问题。信的年代大约是 1306 年, 经过来往中亚的邮驿传送, 将近一年才送到罗马。有一封大约是 1306 年的信, 是多兰廷 (Tolentino) 的教士托马斯 (Thomas) 带来的, 此人显然是取道土耳其斯坦而西返。教皇克里孟特四世终于指命蒙特科维诺约翰为大主教, 并派遣 9 名新主教前来协助。其中有三名主教死于途中, 这说明当时行路之难, 大概他们是取道土耳其斯坦而来的。有一位主教名叫安德雷 (Andreas), 写下了自己的经历。大主教蒙特科维诺死后, 传教事业便告衰落 [38]。

在 14 世纪, 拉施特哀丁同几位学者合作, 写了一部世界史巨著《史集》, 书末附有地理补篇, 遗憾的是, 这一部分今已散逸 [39]。

在 1325 年之际, 有一位圣方济各会教士鄂多立克, 曾经由海路到北京, 在北京逗留了三年, 最后经由陆路通过西藏和巴达克山而返, 可能他也经过了新疆的西南角 [40]。回到巴多瓦 (Padua) 以后, 他在威廉 (William of Solagna) 的怂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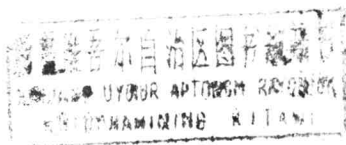
下口授回忆录，由他的教友代笔。不幸未曾完成全书，鄂多立克就在1331年早逝，终年44岁。他的报告首次刊布于1513年，书名为《不解之谜》(Rebus in Cognitis)^[41]。

在1249年，还有一位多敏我派教士安德雷(Andre de Longjumeau, Longjumeau)，奉法王路易九世和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，前往和林了解基督教情况和促进建立教会。他是经由斋桑湖到达和林的^[42]。他1245年自里昂首途，经过阿勒颇(Aleppo)、摩苏尔(Mosul)、波斯和怛罗斯而行抵和林。他到和林的时候，贵由汗又死，政权由贵由汗的寡妇执掌，因此他的使命未能完成。1251年安德雷回到了设在凯萨利亚(Caesarae)的、法王路易的宫廷。他没有撰写报告，我们所知有关他出使的情况，都是他的教友文森特(Vincentius Bellovacensis)记录下来的^[43]。

在1327—1335年间，佛罗伦萨的伯哥洛提(Pegolotti F. B.)曾率领一支商业考察队前来亚洲，显然也是经过土耳其斯坦。他后来写了一部63章的行记^[44]。

1338年元顺帝亦曾派遣使臣前往阿维农(Avignon)会见教皇本纳迪克特十二世(Benedict XII)。这批使节由弗兰克·安德雷(Frank Andreas)率领，此人可能就是斋通(Zaitun)的主教安德雷(Andreas of perugia)，后来教皇便与西西里王罗伯特(Robert)联合派遣一位代表回访，此人就是马里诺

— — —



343407

里 (Florentine Friar John Marignolli)。1338年马里诺里由阿维农出发，取道君士坦丁堡、卡法、(Kaffa) 塔纳 (Tana) 而来，显然走的是北路。这个使团在路上走了三年。马里诺里取道印度西返，后来曾受命撰写波希米亚史。幸而他在那部编年史中为我们留下了访问东亚的回忆。也许马里诺里是中世纪走过这条道路的最后一个欧洲人。在他出使以后不久，蒙古帝国开始瓦解，前来旅游就相当冒险，以致完全停顿了〔45〕。

从遗留下来的书面记录看来，14世纪中叶以后前来旅游者更为稀少，当地出版这类著作也很少〔46〕。

在1419年的时候，波斯皇帝鲁赫 (Shah Rukh) 曾遣使中国，试图重开已经中断的往来。那时中国刚从长期的异族统治中恢复过来，边境已经缩小。这个使团是由沙地·花札 (Shadi Khwaja)、米尔札·巴伊·桑加尔 (Mirza Bay Sangar)、苏丹·阿哈默德 (Sultan Ahmed) 和画师火者·加亚特·乌丁 (Khoja Ghayath-ud-din) 所组成。他们一行于1419年12月自哈烈 (Herat) 出发，经过巴里黑 (Balkh)、萨马尔干、塔什干和赛兰 (Sairam) 而抵达天山，他们显然是走天山南路前往吐鲁番、哈密、肃州和兰州，最后于1420年12月到达目的地，路上走了一年多。他们在北京逗留了五个月，1421年5月取道帕米尔西返，显然是沿“丝绸之路”走到喀什噶尔地区的。1422年9月1日，他们又回到哈烈 (Herat)〔47〕。

当地人撰写的著作则有喀什噶尔王子米尔札·海达儿(Mirza Haidar)——印度皇帝巴伯尔(Baber)的同时代人——的Tarikh-i-Rashidi, 这部著作撰成于他的晚年(即1543年), 描述的是东土耳其斯坦的情况, 包含有大量确切的资料。此书抄本今尚幸存, 19世纪的时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曾劝罗林森(Rawlinson H.)译出, 经过长期拖延, 最后在1876年才出版了肖氏(Shaw R. B.)的部分译文〔48〕。

在1603年, 鄂本笃(Benedict Goes)受命前往中国传教。他由拉合尔到喀布尔, 再跟随一支商队沿“丝绸之路”而行, 1603年11月抵达叶尔羌, 次年经由北道到喀什噶尔、阿克苏、库车、焉耆、吐鲁番和哈密, 而于1605年行抵肃州。他写了一部行记, 可惜没有写完就在1607年逝世。幸而他的伙伴亚美尼亚人艾萨克(Isaac)把书保存了下来, 传给了后代〔49〕。

此后相隔一段很长的时间, 才有俄国沙皇阿列克赛·费多罗维奇派遣的一位使臣费多尔·札科维奇(Фёдор Закович)于1654年前来旅游。他经过斋桑湖和额尔齐斯河上游, 穿越准噶尔到青海长城, 由此再赴北京。他在斯帕斯基(Спасский)的《西伯利亚通报》(Сибирьский Вестник)发表了自己的行记〔50〕。

他的使命是来谈判商约, 但是因为拒绝向中国皇帝叩头, 所以未能面见皇帝交谈。1675年俄皇又再遣使前来, 结果也陷于同样的困境。此后随着边境控制的加强, 中俄两国政府接触更多, 不过主

要是限于土耳其斯坦以东。1684年中俄两国在黑龙江发生武装冲突，但是在1692年签订了一个和平通商条约〔51〕。

在黑龙江冲突期间，中国在新疆捉了一批俘虏（有中国人也有俄国人）。当俘虏在押和留居北京时，俄国教士曾获准前往探视并提供宗教服务。教士可以问到俘虏许多情况，因此得到了许多有关中亚的地理知识〔52〕。

在1653年，还有一位俄国使臣波依索夫（Бойсов С. И.）曾远至斋桑湖旅游〔53〕。

在1661年，曾有耶稣会教士多尔维（A. Dorville）和格鲁贝（J. Gruber）从中国东部通过拉萨到印度。但是他们显然绕过了新疆〔54〕。

在1678年，准噶尔的厄鲁特部酋噶尔丹汗侵入天山南部，俘走了喀什噶尔王，建立了突厥部族的傀儡政府，谓之白山派，直到中国人把他们赶到西边的浩罕为止。后来他们又在这里威胁塔里木盆地，力图重建他们的政权〔55〕。

在1676年，有一位德西迪里（Desideri）神父曾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到北京，他经过的是拉萨，显然也绕过了新疆〔56〕。

因为这些教士代表的是现代欧洲，又是头一批拥有西方科学素养前来旅游并写出亲身经历的教士，所以他们便为地理发现和考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。他们主要注意的不是旅游活动，而是用互相商定的术语报告旅游结果，以便向学术界传播。